

目 录

内容摘要

英文摘要 (ABSTRACT)

前 言	1
第一章 中晚唐枢密使	3
一、始置时间.....	3
二、枢密使产生及兴盛的缘由.....	4
三、枢密使的职掌.....	7
四、枢密使在中枢的地位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10
第二章 五代枢密使	15
一、枢密使在五代的发展.....	15
二、枢密使权势的膨胀.....	18
三、五代枢密使权重的原因.....	21
第三章 宋代枢密使权势的衰退.....	25
一、宋代枢密院概述.....	25
二、抑武佑文政策对枢密使的影响.....	27
三、宋代枢密使权势的衰退.....	30
第四章 结 语.....	33
主要参考文献.....	35

前 言

枢密使是唐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个重要职官，是唐代使职和宦官走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内容。枢密使产生之初“不置司局”^①，权力不大，但凭借其任职者——宦官的特殊身份和职权之便而得以侵削相权，并逐渐进入封建王朝的决策中枢。至宋代，枢密院已完全成为封建中央决策机关的重要成员之一。其性质也由初设时的内廷私人班子转变成外朝政府机关，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唐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枢密使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总的说来，以学术论文居多，鲜有专著问世，其中对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力度较大，对宋代枢密使的研究较为薄弱。从内容上看，对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枢密使的始置时间，主要有唐代宗永泰年间和宪宗元和元年（806）两种观点。贾宪保则认为枢密使完全定型的时间是敬宗宝历二年（826）^②。

第二，关于枢密使在唐代兴盛的缘由，贾宪保认为枢密使是皇帝在宦官权力上升的形势下为分散宦官权力而设的^③；王永平则认为枢密使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其设置的本意在于限制相权^④。

第三，关于机构建制和职权，一致认为枢密使设置之初“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亦无须听差、衙役；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及其职权的加强，枢密使开始增加一些属员。唐宣宗以后，枢密机构已扩大成使院，昭宗时又发展为上、下（或东、西）两院。不过终唐之世，其属员与机构尚未完备。五代时枢密院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封建政府不可缺少的重要机构。从表面上看，枢密使最初的职掌只是承受表奏、出纳帝命，降及五代，其权势已涉及封建国家财、政、军各方面大事，实权极大。

第四，枢密使在政治中枢的地位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枢密使在中晚唐的出现改变了三省六部制而形成了以枢密使、翰林学士、宰相为主的新的决策中枢。戴显群甚至认为作为宦官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枢密使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⑤。王永平认为唐代枢密使由于职掌还很不稳定，人员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枢密使基本上还是在皇权的羽翼下发挥作用^⑥。杜文玉认为，五代枢密使权重，并非某一时期的权臣专权，而是贯穿了整个五代时期；不是某个方面权力太重，而是囊括了封建政权的各个方面^⑦。

①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院》

②③ 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唐史论丛》（2）1987年1月

④ 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科版）》1991、4

⑤ 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⑦ 杜文玉：《论五代枢密使》，《中国史研究》1988、1

宋代君相权力的消长问题一直是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因此对宋代枢密使的研究也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专论枢密使的文章较少。如王瑞来认为宋代枢密院所掌握的不过是一些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而已^①。张其凡也认为除个别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②。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一文从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的情况入手,全面考察了枢密院长贰由武将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从对比文臣与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地位和影响差异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以文驭武”方针在宋代枢密院机构中的具体表现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③。

对枢密使制度的探讨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特别是唐中期以后中枢权力构成研究的重要课题,对阐释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演进及其特征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史学界在枢密使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在欣喜之余,又不能不看到,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就研究对象而言,多为断代研究,且偏重于唐、五代,对宋枢密使的研究较为薄弱。对该职官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的整体研究则几乎没有,也很少将枢密使与同时代的其它职官进行横向比较,或对不同朝代的枢密使进行纵向比较。因此,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对枢密使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综合考察,以期对君主专制体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中枢权力的转移和重新分配的历史过程作一具体的诠释。

① 王瑞来:《论宋代的相权》,《历史研究》1985、2

② 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大学报》1986、2

③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2

第一章 中晚唐枢密使

枢密使始于唐代中后期，五代、宋各朝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职官。但枢密使既非凭空而生，亦非在其产生之初就有显赫的地位，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一、始置时间

枢密使，因其设置之初“不置司局”^①，新、旧《唐书》及《唐会要》诸书都不叙其始末，学界对其始置时间也看法不一，主要有代宗永泰二年（766）和宪宗元和年间两种观点。前者的依据是：《资治通鉴》大历元年（766）十二月条：“宦官董秀掌枢密。”胡三省注：“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按：大历元年即永泰二年，是年十一月改元）。《旧唐书》卷一二六《陈少游传》亦云“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资治通鉴》元和三年（808）正月胡注：“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以宦者为之。”永泰年间以宦官董秀掌枢密可说是枢密使的起源，但还只是临时性的使职差遣，没有正式使名，因此代宗永泰二年始置枢密使之说不够准确。持第二种观点者的依据有：“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②；《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宪宗初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暱善，颇窃朝权，吉甫请去之”；《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情通”；《资治通鉴》元和三年正月：“知枢密刘光琦奏分遣诸使赍敕诣诸道”；又《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收权利”；《资治通鉴》元和五年（810）四月：“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绛”；同书元和八年（813）正月：“有梁正言者，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但是，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1、元和中刘光琦、梁守谦都曾掌枢密，但不能断定二人是否同时担任该职。据《资治通鉴》载，刘光琦于元和三年已任知枢密，而关于梁守谦任枢密使的记载则始见于《资治通鉴》元和五年条。《金石萃编》卷一〇七《梁守谦功德铭碑》亦云：“（元和）五年加金紫掌枢机……”，说明梁掌枢密的时间比刘可能要迟二年。又“刘光琦宪宗时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致仕，元和七年（812）正月赠扬州大都督，以掌宣转枢密故也”^③，“扬州大都督”是给亡故大宦官的赠官，说明刘光琦在元和七年正月以前去世，致仕更应在此之前，很可能是元和五年致仕，由梁守谦继任枢密之职，即在刘光琦之后梁

^①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院》

^②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

^③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恩宠》

守谦亦是一人掌枢密。这样，《册府元龟》所云“二枢密”之说就颇显牵强。2、元和年间尚未确定“枢密使”之官称。从上引材料可知，常用的是“知枢密”、“典枢密”、“掌枢密”等，“枢密使”虽有出现但频率极低。再看《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新唐书》卷二〇八《王守澄传》：“乃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资治通鉴》长庆元年（821）十月：“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这些记载说明到长庆年间仍未固定使用“枢密使”这个名称。因此，《资治通鉴》元和年间就出现枢密使的名称之说未必可信，《册府元龟》所云元和年间“置枢密使”亦难证实。但无可否认，宪宗朝是唐代枢密使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直至有关宝历二年的记载，各书才一致使用“枢密使”之称。如《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上》：“宝历二年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贼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勾当军国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上于江邸。”《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克明传》：“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新唐书》卷八《文宗纪》：“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刘克明等矫诏以绛王勾当军国事。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军、飞龙兵诛克明，杀绛王。”《资治通鉴》宝历二年十一月亦载：“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义，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了两个并列的枢密使，称呼也由“知枢密”、“掌枢密”等变为“枢密使（内枢密使）”。这两个变化同时出现说明唐代枢密使制度至此已基本定型。

二、枢密使产生及兴盛的缘由

唐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行“中书门下之印”，又列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于政事堂正厅之后，其中枢机房当为枢密院的雏形，不过当时其权力还掌握在宰相手中。中唐以后随着宦官势力上升，中枢机密之事始有宦者插手。玄宗时“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①，宦官高力士在此行使的就是后来枢密使“承受表奏，于内进呈”^②的职权。代宗永泰二年，“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③，是由宦官专掌枢密的开始。之后枢密使制经宪宗朝发展，至敬宗宝历年间基本定型，历数十年，其势日增，并对当时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如此发展起来的官制显然不是个别皇帝别出心裁的恩宠，应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首先，枢密使产生并获得巨大权力是唐代宦官专权以及中唐以来政治中枢演化的结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院》

^③ 《旧唐书》卷一二六《陈少游传》

果。其一，枢密使是宦官权力上升的必然产物。宦官处理机密事务于玄宗朝已开其先例，高力士即兼典枢密之任。肃宗朝时李辅国更甚之，“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①。不过，这种一人独掌大权的情形难以持久，因其既不利于朝政，又不利于皇帝。于是皇帝便将宦官的权力分散，专设军职管军队，如神策军中尉；另置人专管政务，遂设枢密使。枢密使制的定型意味着一部分宦官将由宫廷服务人员逐渐转变为政府官员。尽管皇帝从制度上限定了宦官的权力，但由此形成了宦官参政的新中枢体制。宦官参政合法化、制度化了。其二，枢密使从候旨殿西、传递诏令到上下其手、干预朝政，其兴盛与唐朝中后期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如司马光所言：

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预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履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雍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②

这番话对唐朝宦官干政的具体过程的分析，是颇为中肯的。自从武则天改制以后，唐代前期的各种制度已出现新的转变趋势。玄宗时整个社会都面临着新旧的交替，朝官擅权、武将专横、藩镇跋扈等现象在经过安史之乱之后更显突出与尖锐。唐代君主周边无靠，便将视线转移到宦官身上。如李辅国在危难中协助肃宗号立，于是继李辅国后，程元振、鱼朝恩以及窦文场、霍仙鸣这类人物便相继登场。德宗在历经蒙难之后，嘱意宦官掌握神策军，首开唐朝宦官掌军权之先例。宪宗上台，又让宦官知枢密事，用宦官参与中枢决策，从而形成宦官内预朝政，外握兵权的局面。所以说，枢密使的出现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第二，枢密使在唐后期政治中由一般地位升至“四贵”，居宦官势力之巅，还得助于枢密使职务本身的特殊条件。枢密使的最初职掌“唯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③。从表面上看，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皇帝与中书门下之间，向上承受表奏，向下出纳帝命，权力非常小，但实际上关系到军国机密，这就使这一职位显得相当重要。再者因地处近密，容易受到皇帝的宠信，因而枢密使往往可以依据自己的好恶，掺入个人观点。对上，枢密使承受表奏进呈给皇帝，可以打着群臣意见的幌子加入本人看法；对下，他出纳王言，又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可以皇帝的旨意压迫群臣，甚至以矫诏的形式下达命令，这就使枢密使一言九鼎，乘职权之便，即可逐步进入决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昭宗天复三年

^③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院》

策集团之内,有机会参预国家中枢机务与决策。如果说神策中尉猖肆的资本是手上的兵权,那么枢密使得以专权弄政凭借的则是职权之便。《新唐书》卷二〇八《宦者下》所云延英奏事,枢密使虽则案前受旨传递诏令,但在传送中或更改诏文,或直接奏事,甚至与宰相一同帷幄决策,进而发展到废立君主,决定朝祚,所有这一切,均得之其传送诏旨、接近皇帝的特殊条件。除此之外,宦官这类人的特殊性也为唐代枢密使权力的迅速上升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宋人孙逢吉所言:

(宦者)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终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远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①

封建君主生活在深宫禁廷之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宦官。密切的接触自然会使帝王们感到宦官更为亲近。相对而言,朝臣就疏远多了。为维护君权,裁抑以相权为首的臣权,皇帝重用亲近之宦官亦是常情,这就给了宦官专权的机会。唐代枢密使正是利用了这种特殊身份得以扩张其权势的。

第三,唐代枢密使势力膨胀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古代中枢机构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皇帝依靠宰相治国,但又惧怕相权过重,因而利用内廷私人班子来牵制相权,甚至将其架空。自西汉中期起,汉武帝开始任用内朝亲信参预机要,以尚书为代表的内职开始染指政权,其职权已由专掌文书事务扩大到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后又有中书、门下等官职的继起,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这些内朝官员逐步取代原来外朝的三公九卿而成为政府官员。可见,历朝君主为了巩固皇权,总是把亲近顾问、侍从、秘书人员安插到政府要职上。一旦内廷私人班子转化为外朝政府机构,他们与皇帝原有的亲密关系也就宣告结束,而被新的君相关系所代替,皇帝周围也会以各种方式重新聚结新的亲信权势集团,宰相制度亦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唐朝三省制确立不久,便出现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一类的职号,行使宰相之权。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林立,手握地方军、政、财三权的各节度使成为君主的心腹大患,而三省制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严重破坏,原来的宰相职权渐失,上层统治

^① 《职官分纪》卷二六《内侍省》

集团核心处于不稳定状态，朝廷对各项事务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在此情形之下，内诸司使作为平衡各种矛盾、巩固皇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应运而生，枢密使便是其中之一。宦官乃“刑余之人”，地位卑贱，只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对皇权无实质性威胁。因此，从维护自身权力的角度考虑，统治者往往愿意把军政大权交给他们最信任的宦官，用他们来监督、制约诸王将帅和朝臣。但唐初对宦官数量进行严格限制，不允许他们参与朝政，这就使宦官无法象一般人那样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因此，要让宦官插手朝政必须通过特殊的方式与途径，而使职差遣恰恰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在宦官头上冠以诸使称号，他们即由家奴摇身一变而成为皇帝的代言人和特派员，或衔命出使，或居中用事，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政治前台。所以德宗以宦官掌握禁兵，而宪宗以宦官参预政权，便成为当时政局下的自然选择，枢密使就在这时应运而生。尽管宦官势力在唐朝末年被朱温、崔胤等诛灭，但枢密使一职及其机构并未因此被废，反而在五代数十年的历史中得到空前的发展，逐步转化为封建国家正式的中枢决策机构，正是适应了封建政权内部结构变化规律的必然结果。

三、枢密使的职掌

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又称内枢密使，设置之初为临时性差遣，其职责仅是承受表奏，出纳王命。制度因事而立，也必因事而变，枢密使的设置与发展也不例外，它的职掌范围也必然随着时势之变而变：

旧左右军容多入为枢密，亦无视事之厅。后僖、昭时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此其始也……按：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侔于宰相，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元之徒遂至于视事行文矣。^①

可见枢密使的职权范围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初只包括宣传诏令、承受外朝表奏进呈于皇帝，虽属机要工作，具体做的只是事务性工作。权力扩展后，逐渐执掌国家机密，决策军国大事，到唐末僖昭之时，则已“权侔宰相”了。为便于了解唐代枢密使的具体职权，我们可将其权势在唐代的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开元十一年（723）在政事堂后设枢机房专掌朝廷机要大事，到永泰二年代宗委派宦官“知枢密”，是枢密使的萌芽时期。枢机房是外朝宰相掌机密的关键机构，一开始便与宦官有密切的联系。凡有机事，皇帝即遣宦官往政事堂枢机房传达，使居于外朝的宰相机构能经常与内朝皇帝沟通，信息往来不绝，得以保持中枢决策地位。而宦官传

^①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院》

宣，则是其中关键性的环节。可见，这时虽尚未有枢密之名号，但因实际政务需要，宦官已参预枢密之事。枢机房可以看成枢密院的雏形，而承担其工作的宦官即枢密使的前身。

第二阶段：从代宗永泰二年董秀掌枢密始，到宪宗即位，是枢密权力扩展，并由临时差遣向固定使职发展的重要时期。《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注引项安世《家说》云：“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则枢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人，始以枢密归之内侍。”当枢机房的机要职事被宦官搬进内廷，政事堂就失去了决策地位，枢密使的职权发生质的变化，枢密使也成了新中枢的成员。这个阶段，反映的就是这一过程。安史乱后，三省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内朝事权大为扩展。为了进一步沟通外朝宰相，代宗始置宦官“知枢密”。枢密一职虽属临时性差遣，但一经出现，其权势就十分引人注目。当时的权相元载就曾与知枢密董秀相勾结：“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时海内多务，宰相元载等见中官传诏命至中书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①。按旧制，宦官传旨只得入堂后枢机房，不得入堂前议事厅，以免干扰宰相决策，而元载竟在宰相办事处“置榻”接待“中官传诏令至中书者”，说明传旨宦官的地位有了提高。枢密作为皇帝和宰相的中介，容易招致权力，干预政事也极为方便。元载在外廷，难以揣知君心，通过董秀才得以事事称旨合意，于是竭力巴结，可见知枢密已处在中枢权力的要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第三阶段：从宪宗即位到唐武宗时期，是枢密置使定制，开始专权乱政的时期。自代宗永泰中以中人掌枢密始，枢密使制迅猛发展，宪宗朝是枢密使制逐渐成为定制的重要时期。《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元年载：“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政事堂一个主书小吏依仗枢密使，竟敢在宰相面前指手划脚，说明其时枢密使已有操纵政治的动向。又“枢密使刘光琦奏分遣诸使赍敕诣诸道，意欲分其馈遗，翰林学士李絳奏：‘敕使所至烦扰，不若但附急递’。上从之，光琦称旧例。上曰：‘例是则从之，苟为非是，奈何不改！’……”^②元和五年：“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谋于（李）絳”^③，枢密已和翰林一样议事上奏，以机要大臣的身份谋议政事，外朝大臣只有联结枢密使才能自重。如穆宗时，“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④；长庆三年（823），王守澄入知枢密，宰相李逢吉因与之勾结而“势倾朝野”^⑤。武宗时李德裕因枢密使杨钦义而

^①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峴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宪宗元和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宪宗元和五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穆宗长庆元年

^⑤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穆宗长庆三年

得入相。敬宗宝历元年（825），“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①，新中枢体制内部的权力关系很快就出现了偏斜，枢密掌政成为宦官专权最重要的形式。《资治通鉴》卷二四四载，文宗大和九年（835）：“初，李宗闵为吏部侍郎，因驸马都尉沈立羲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得为相”。武宗会昌元年（841），“户部尚书杜惊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又邀枢密使至中书，使入奏，以为：‘德宗……’”^②

唐宣宗以后是枢密使发展的第四阶段，其制度、机构、权力等各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如上所述，枢密使始置之初“不置司局”，至穆宗长庆中仍“无视事之厅”^③。但随着事权的扩大，枢密使的办事机构和内部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宣宗时“院”的出现，是唐代枢密使制度发展中的一次大飞跃。自此，枢密不但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办事机构，其内部也有了一个上下级关系分明的组织系统，有了下属的“枢密承旨”和“枢密院吏”。《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九年（855）条载：“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之不见，辄足成之（唐末，枢密承旨以院吏充）”。既由院吏充，则承旨以下院吏必有相当数量，并皆为枢密使的僚属。可见，宣宗时枢密院已有使、承旨、院吏三级官，机构和人员已有一定的规模。至唐末昭宗时，枢密院又分为上、下两院：“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胡三省注：“枢密分东、西院，东院为上院，西院为下院”^④。又《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吴承泌墓志》有“充西院承旨”的记载，则可知其院属也分为两院，有了分工，可见枢密院至唐朝灭亡前已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完备，组织庞大的内廷办事机构。

到晚唐，枢密使被外朝宰臣视为“内大臣”，其权力地位已无可非议。懿宗朝枢密使干政愈发突显，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五懿宗咸通二年（861）条：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惊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惊，发之，乃宣宗大渐时请郗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惊反复读，良久，曰“圣主登极，万方欣戴。今日此文书，非臣下所宜窥。”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惊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

僖宗时正值农民大规模起义，朝廷内外混乱，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枢密使更加肆无忌惮。乾符四年（877）十月，宰相郑畋上言：“宋威欺罔朝廷，……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敬宗宝历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武宗会昌元年

^③ 《文献通考》卷五十八《枢密院》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唐昭宗天复元年

参酌。”胡三省注：“内大臣，谓两中尉、两枢密”^①。外朝宰相政事不能决，要交与“内大臣”最后裁定，“内大臣”的权力已凌架于相权之上，宦官专政达到了顶峰。

到唐末僖、昭之时，枢密使已不满足于在内廷弄权预政，而极欲获得外朝官的身份和地位。宦官力争“白麻除授”，要求命官时取得和朝官相同的礼仪。僖宗广明元年（880），“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唐制，拜将相，先一日，中书纳案，迟明，降麻，于阁门出案。……史言唐末宦官恣横，监军与枢密使，恩数埒于将相）”^②。宦官还力争朝服执笏，竭力把自己打扮得和朝官一样，《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昭宗龙纪元年（889）十一月：“故事，中尉、枢密皆袴衫侍从；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胡三省注曰：“法服，谓冕服剑佩也”。而且，皇帝召宰相延英议事，也有枢密使“侍侧”监视，“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③，俨然成为统治集团核心人物。此时担任枢密使和两军中尉的宦官，较之于往昔的家奴身份实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唐末枢密使的所谓“堂状后贴黄”制度，是宦官干政的重要形式，《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枢密院》：“僖、昭时，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石林燕语》卷三云：“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贴黄”即批改诏敕。枢密使以此来指挥公事，几乎控制了整个中枢政治。由此可见，宣宗以后直至唐亡乃宦官实行全面专政的时期，枢密使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概而言之，唐代枢密使的职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承传诏令表奏；第二是参掌机密；三是干预朝臣的任命甚至皇帝的废立。不过，唐代枢密使权势之大，与宦官在唐中后期的势力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除了承传诏令表奏外，枢密使的权力在唐代并没有正式的制度上的保障。换言之，唐代枢密使参政预政是不合法的。发展到五代、宋，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枢密使的权势已得到了制度上的肯定。

四、枢密使在中枢的地位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封建职官的设置，不可能是某个皇帝心血来潮之举，而必有其现实的意义。枢密使的设置，适应了中唐以后政治形势的需要。它的产生及新中枢的建立，使唐中枢长期混乱的状态暂告结束，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如元和中，唐宪宗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广明元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昭宗天复元年

依靠宰相、枢密使和翰林学士的紧密合作，一度取得了讨平藩镇的巨大胜利。据《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垪传》：“初，垪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垪”。后裴垪升任宰相，又与宪宗策划讨卢从史，“垪请密其谋，宪宗曰：‘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时绛承旨翰林，守谦掌密命”。《通鉴》宪宗元和五年条载：“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绛”。可见中枢三成员的确曾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共同谋划，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发挥了积极的效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枢密使产生之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后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局面日益严重的特殊环境下，对中晚唐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枢密使乘职权之便，通过各种形式参政预政，扰乱中枢决策。1、参预任命或惩处宰相大臣的重大事件。如武宗命相，夜召学士韦琮，令其背着枢密使刘行深和杨钦义草制，引起老宦官的极大不满，认为“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①。可见，按旧例，皇帝不能绕开枢密使自行命相。大中十年（850），宣宗欲任命萧邛为相，亦须先与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商议，然后再由枢密使宣旨下达命令，“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前此一日，令枢密宣旨于学士院”^②。李德裕入相亦得力于枢密使王践言和杨钦义。懿宗初立时欲治罪宣宗大渐时没有拥立他的宰相，便授命两枢密诣中书省宣命，新任宰相杜惊对两枢密说：“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资内外裨补，固当以仁爱为先，刑杀为后，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③，终于说服两枢密，使毕诚、杜审权、蒋伸等三位旧相免遭杀身之祸。2、插手皇帝的废立。唐朝皇帝自穆宗即位始，至昭宗之立，几乎都是经过一番复杂的宫廷内争才确定下来的，以枢密使和神策中尉为首的宦官集团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资治通鉴》宝历二年载：敬宗死，“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随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刘克明“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枢密使与神策中尉同受威胁，他们便联手进讨刘克明贼党。光化三年（902）幽废昭宗，以太子监国：“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阴相谋曰：‘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主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华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④。枢密使在这些宫廷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与大臣共参国事。武宗会昌四年，宰相李德裕鉴于宦官监军的弊病，与枢密使杨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武宗会昌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大中十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 懿宗咸通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 昭宗光化三年

钦义、刘行深商议，“约敕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霑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①。枢密使还直接参加了宰相的延英奏事。宣宗颇抑宦官，故定制枢密使不能直接参加延英奏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②。天复元年，昭宗复位后欲限制枢密使的权力，下令枢密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然形势已今非昔比，诏书还没来得及执行就遭枢密使韩全诲的破坏。同年冬十月，“韩全诲等令上入阁，召百官追寝正月敕书，悉如咸通以来近例。是日，开延英，全诲即侍侧，同议政事”^③。僖、昭时枢密使杨复恭与西门季元以“帖黄”的形式“指挥公事”，公然侵夺宰相之权。加之枢密使勾结翰林学士，连宰相也无可奈何。穆宗长庆年间，“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裴）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④。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农民起义军进逼潼关，形势十分危急，兵马先锋使张承范上表告急：“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胡注：“近密，谓两中尉、两枢密”^⑤。张承范在此直截了当地提出与枢密使同议，证明枢密使已成为唐新中枢的决策者之一。

第二，枢密使收受贿赂为外廷士大夫求为将相大臣，并互相勾结利用，是唐后期朝政腐败的重要原因。穆宗时枢密使王守澄“专制国事，事倾中外……始则有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求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面其门也”^⑥。李德裕两次入相，都是靠贿赂枢密使才成功的。文宗大和六年（832），“王践言为西川监军，节度使李德裕加征疲人三十万贯缗，因践言赴阙，尽以钱行。及践言为枢密使，德裕果为宰相”^⑦。李德裕再次入相，靠的是另一枢密使杨钦义的关系，“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值？’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⑧。正因为枢密使有如此大权，因此许多朝臣纷纷奔走于枢密使门下，争与之交结，厚赂请托，以求政治上的发展。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到之处加紧剥削压榨，加剧了中晚唐的阶级矛盾。

第三，枢密使经长期演变，已具有与宰相相类似的权力，其地位及在中枢的作用也和宰相不相上下。但它又不能等同于宰相，虽然对朝政有巨大的影响和实际权力，却不能单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武宗会昌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 昭宗天复元年正月胡注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 昭宗天复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穆宗长庆元年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 僖宗广明元年

^⑥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穆宗长庆三年

^⑦ 《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部·贪货》

^⑧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文宗开成五年

独执政。一方面，由于唐枢密使的职掌还不稳定，人员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枢密使基本上还是在皇帝的卵翼下发挥作用。王播原领盐铁使，“敬宗即位，即拜检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职，见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谢，守澄乘间荐之……遂复领使”^①，枢密使有权荐引大臣，但最终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说明此时枢密使还得借助皇权。虽然枢密使因地处近密，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皇帝并获得皇帝的宠信，甚至委以重任。但是，当皇帝无法庇护枢密使时，它们必然受到手握重兵的神策中尉的制约。文宗开成五年，“时上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引杨嗣复、李钰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钰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涯王为太弟”^②，是为武宗，受托孤之任的二宰相与二枢密使随后都被中尉仇士良诛杀。宣宗临终时，也曾托孤于枢密使，“上密以夔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枢密使等三人受诏后，与他们“素不同心”^③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出为淮南监军。但王临时应变，另立郢王，是为懿宗，并诛杀受宣宗遗命的两枢密使与宣徽南院使，一举扭转了政局。在神策中尉的实力面前，天子遗诏形同废纸，枢密使更无力抵抗。值得重视的是，宦官杨复恭在僖宗中和年间任枢密使时曾遭中尉田令孜的排挤，后因田失势而复为枢密使，光启二年（886）出任左神策中尉，兼观军容使。在拥立昭宗的行动中，他从过去任枢密使时的受人排挤转而排斥新任枢密使严遵美，前后对比强烈，正是因为他的职务变了，权力与地位也随之变化。由此也可看出，在天子无力庇护时，手无实权的枢密使只能任神策中尉宰割。

另一方面，任枢密使者的宦官身份限制了这一职官在唐代的发展。因为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宦官专权只能依赖于专制君权。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从君权中分泌出来的，如果没有君主，社会上根本就不会有这些集团存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宦官专权。他们得宠则可得势，失宠亦必失势，若是君主势微，其地位势必难保，还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纵使唐代宦官有各种机会参政预政，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所限制，枢密使始终无法得到与朝臣相埒的恩数与礼遇。即使唐后期中尉与枢密使除授时“皆降白麻”，与将相同，那也只是宦官专权下才有的特殊现象。五代、宋时枢密使除授仍降麻，但那时任枢密使的已非宦官。

从官制上看，枢密使和神策中尉同属宦官集团，在职务上分掌军政，他们表面上互不统属，地位相当，实则不然，枢密使在中枢政治的职权远远大于神策中尉，但神策中尉凭借手中的神策军拥有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对枢密使的合法权力屡有侵夺，对此枢密使又不甘让步，往往酿成流血冲突。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使得宦官内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① 《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文宗开成五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大中十三年

而宦官与朝臣特别是和宰相之间的权力斗争亦是延绵不断。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中央政府统治秩序的混乱和权威的丧失，国力日衰，唐王朝已岌岌可危。唐末，朝臣与宦官的矛盾日益激化。以宰相崔胤为首的朝臣欲诛宦官，但苦无兵力，于是借助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以中尉韩全诲为首的宦官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相对抗。宦官韩全诲先迫昭宗迁往凤翔，投依李茂贞，宰相崔胤则“促全忠以兵迎驾”^①，带兵入关，进攻凤翔。天复三年，朱全忠打败李茂贞，大诛宦官，唐王朝最终被朱全忠所颠覆。可以说唐朝的灭亡，与当时宦官专权有相当大的关系，作为宦官集团首脑的枢密使自然难辞其咎。如清人赵翼所言：“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②所论是极为精到的。

^① 《旧唐书》卷二三上《昭宗纪》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〇《唐代宦官之祸》

第二章 五代枢密使

一、枢密使在五代的发展

五代枢密使继唐而来，但并非唐代枢密使的简单翻版，而是在此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继续发展并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唐代枢密使的特点。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枢密使之权在五代得到空前膨胀，发展至其顶峰。

首先，唐代充任枢密使者为宦官，五代改用士人。“昔唐朝择中官一人为枢密使，以出纳帝命”^①，唐末昭宗天祐元年（904），朱全忠、崔胤大诛宦官，从凤翔到长安及各地监军使，共九十余人被杀，宦官从此退出唐朝的政治舞台。朱全忠取缔了两军中尉和两枢密，仅以内夫人“宣传诏命”及“领内诸司事”^②。这一时期，由于各地强藩军将势力极大膨胀，神策中尉的存在对他们构成威胁，取缔神策中尉正符合了野心勃勃的地方集团的意愿。但枢密使这一特殊职任，却正好可以为这些集团所利用。为此，朱全忠在唐昭宗天祐元年迁都洛阳以后就恢复设置枢密使，但改以士人蒋玄晖充任。《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以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皆全忠之腹心矣。”清人赵翼认为以蒋玄晖任枢密使是“枢密使移于朝士之始”^③。利用枢密使的特殊职位，蒋为朱全忠提供宫廷内部各政治集团的动静。正所谓“全忠使之伺察帝，动静皆知之”^④。天祐二年（905）十二月，在消灭了李唐宗室及阻挠朱梁代唐的主要势力，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朱全忠就诛杀了蒋玄晖，旋即取缔了枢密使，“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独置宣徽使一员”^⑤。枢密使在唐代的政治使命至此宣告结束。

后梁建立以后，重又设置了枢密使，但更名为崇政使。以崇政院代替枢密院，只是名称上的变化而已。但崇政院使用敬翔这样的士人，则与唐代以宦者为枢密使完全不同。以朝士代替宦官，加强了崇政院作为皇帝顾问机构的作用，这无疑将枢密使由内廷走向外朝大大推进了一步。后唐同光元年（923）恢复枢密使旧称，以中门使郭崇韬和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不过当时居中用事的是郭崇韬，张居翰只是“承颜免过而已”^⑥，至“庄宗即位，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庄宗灭梁而骄，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韬又专任政，居翰默然，

^①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 昭宗天祐元年闰四月、《旧唐书》卷二三《昭宗纪》

^③ 《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 昭宗天祐元年

^⑤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 昭宣帝天祐元年

^⑥ 《旧五代史》卷七十二《张居翰传》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